

先秦游士

杨柳 著



当代

先秦游士

杨柳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游士/杨柳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ISBN 7-80092-556-0

I. 先… II. 杨… III. 士-研究-先秦时代 IV. D6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5526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 9.375 印张 2 插页 201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序

先秦，中国古代文化光芒辐射之时代也。此时文化之所以包涵广大，呈现于历史舞台，由于士阶层之崛起，士集团之结集，此又由于时代之孕育，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俱在其内。士，有广义与狭义之殊，孔子以后所谓士，则主要指知识分子阶层，《论语·泰伯》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者是。春秋战国之时，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所列九流十家，胥士也。《庄子·天下》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老聃、孔子、庄周、墨翟、邹衍、孟子、荀卿以思想家鸣，管仲、晏婴、子产、申不害、商鞅、韩非以政治家著，吴起、孙武、孙膑、乐毅、白起以军事家显，苏秦、张仪、蔺相如以外交擅猷，惠施、公孙龙以论辩树纛，农学则有许行，水力学则有李冰、郑国，天文学则有甘德、石申，吁！何其盛也！恩格斯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有云：“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

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方之先秦，若合符契。百家志在匡时致用，游历各国，如《汉书·儒林传序》所谓“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孟子·滕文公》所谓“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是为规模弘大之游士群。复有个人游历各国者，不胜缕指。士无定主，合则留，不合则去。其时诸侯王又百计延揽，齐于国都稷门外立学宫，高门大屋尊宠之。著名学者邹衍、田骈、慎到、环渊、彭蒙、宋钘、尹文、邹奭、荀子纷至沓来，汇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各家于一地，星斗满天，光辉璀璨。齐昭王筑宫礼贤，天下贤士奔趋其下。《论衡·效力篇》所谓“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者也。上层贵族亦复蓄士养士，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春申君四公子，养士俱在千人以上，稍后，秦之文信侯亦然。盖战国诸子多游士，上下相需，以就其功，所以臻于极盛也。

杨柳先生，博学士也。毕业于中央大学及中央大学之研究院，根柢盘深，并精通英吉利、法兰西、俄罗斯诸国文字。英年就学研究院时，即草创《先

秦游士之研究》一巨著，创见新解，胜义迭现。自总论士递及游士之概念、派别、学养、生活、游说与辩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计谋等有关诸项，以新思想、新方法进行解剖，洞见邃奥，采入其旨，弦外之音，亦箴时弊。是书之功在学术界，固不待余之赘言矣。先生暮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夕阳无限而霞绮忽散，哲人萎谢，志业未竟。余与先生，谋面不多，相契在心。读其遗著，钦服弥襟。今晓东、晓华二女公予以是书之序相属，余焉敢辞。因念先大父楞仙公曾著游士论，载《示朴斋骈体文》卷五，于游士之流弊，推本顾亭林氏之说，痛切言之。与先生是书，针对性不同，言各有当而已。以是因缘，奋笔引喤，益增无穷之喟矣。岁在癸酉阳月，八十六叟钱仲联^①序于苏州大学。

① 钱仲联 1908 年出生，江苏常熟人，曾先后供职于无锡国文专科学校、中央大学、江苏师范学院，现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

目 录

序	钱仲联
第一章 论士	1
第二章 游士之概念	22
第一节 游士之意义	22
第二节 游士之产生（上）	28
第三节 游士之产生（下）	32
第四节 游士与游民	42
第三章 游士之派别	48
第一节 概述	48
第二节 民主派	55
第三节 功利派	63
第四节 狂放派	68
第五节 权术派	75
第六节 谗辩派	80
第七节 正统派	86
第四章 游士之学养及其生活	94
第一节 游士之学识	94
第二节 游士之修养	107
第三节 游士之日常生活	118

第五章 游说与辩论	127
第一节 游辩之重要	127
第二节 游辩之出发点	134
第三节 游辩之技术（上）	143
第四节 游辩之技术（下）	157
第六章 游士与政治	170
第一节 民主思想与官僚政治	170
第二节 天下观念与统一运动	187
第七章 游士与军事	205
第八章 游士之经济思想	222
第九章 游士之外交政策	240
第一节 合纵与连横	240
第二节 远交近攻与远攻近交	250
第三节 外交上的“鼓励”与“软化”	261
第十章 游士之计谋	270
第一节 美人计	270
第二节 黄金计	273
第三节 反间计	280
杨柳生平大事年表	286
后记	293

第一章 论士

游士为士之一种，故欲研究游士必先讨论“士”，对“士”有了清晰而明确的概念，然后再进而讨论游士，就不难融会贯通，收事半功倍之效。

“士”之起源甚早，其内容及意义亦随时代之进步而改变。故欲对士下一明晓界说，颇属困难；若强以今语言之，则“士者，知识阶级也。”中国古代，“职业”和“阶级”两个观念没有若何区别，每一种职业各自形成一种阶级，而阶级地位之高低亦决定于职业性质之优劣。换言之，即以职业性质之优劣为区别阶级地位之高低的标准，这和今日西方之以财产为标准而分阶级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者大有不同。

中国原有的“士、农、工、商”，可以说是阶级的分类，也可以说是职业的分类。“士”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最高尚的职业：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不亦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滕文公》）

这段记载，已明显地暗示出士为一种职业，所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是也。这段话可加以扩张解释，认为“士之仕也”，不仅如“农夫之耕也”，同时也犹“工人之成器也，商人之行贾也。”士既为一种职业，因此士之“失位”也就是失业。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孟子·万章》）这更可作为士是一种职业的证明。

“士”因为是一种最高尚的职业，故在社会上亦最受人崇敬。在中国，和西方不同，只要是属于士人阶级，那么，纵然家徒壁立，贫无立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仍旧是隆高的。孔子自己就曾经自豪地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又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士、农、工、商”四种职业，或者说四种阶级，其贵贱高卑既有如是差异，故最初都有世袭性质，不得混杂超越，正如管子所说者然：

“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管子·小匡》）

其后因社会进化，教育解放，故士人阶级界限逐渐泯灭，农人、工、商经自身之努力成为士子而参与政治活动者，不在少数。关于这，我们后面还有谈到的机会，兹不多赘。

前面说过，士就是知识阶级，但此所谓知识阶级，并不限于文人阶级，武士阶级亦应包括在内。但不管其为文人阶级（或称文士）或武人阶级（或称武士），“士”最初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的。良以古代知识传授秘密，只有贵族子弟，始得入太学，受教育；普通一般细民，则

无是项权利也。士之来源有了限制，士之人数自甚稀少；因此每人都有充分的机会参加政治活动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其他农工商三阶级的人民，因为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所以只有永远从事于农业，或从事于工商业，成为驯良的被治者。统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孟子已经阐述得很明白了：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

孟子所谓“大人”就是指“士人”而言，“小人”就是指农夫与工商而言。士人的职务是统治，农夫、工、商的义务是服从“大人”的统治。

士既然成为统治阶级，那么想维持自己的地位，防止人民的反抗，必须要懂得政治和军事。懂得政治，才能行使百政，统治人民；懂得军事，才能率领军队，戡平叛乱。因此，贵族子弟一入学校便须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及政治训练。在小学教国子的有师氏、保氏。（《周官》）

师氏所教课目如下：

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所谓至德，大概是古代宗教及哲学上的训练，孝德大概是社会政治上的伦理训练。

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保氏所教课目如下：

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这是古代贵族子弟所受的小学教育。其中如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顺行，礼、书以及朝廷之容等，皆为政治、社会或伦理方面的训练。又如，射、御、军旅之容、车马之容等皆为军事训练。

至于大学，其训练课目似乎偏重于政治方面；《礼记》：“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制》）

贵族子弟他日都有成为统治阶级一份子的可能，统治者所最需要的是一般的常识，换言之，即需要如今日之通才教育，因为政治原来就是一种复杂的工作，从事政治者所要具备的也就是复杂的知识，这和学者之需要懂得高深的专门知识，固有不同者也。因为，要实行通才教育，授以许多性质不同的知识，学制方面必须要有和这种要求相适应的特殊组织。蔡邕说：“太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大学，天子之所自学也。”（《明堂论》引《易传》语）又说：“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大学，承师而问道。”（《明堂论》引《礼记·保傅篇》）由这段引证，可知古代教育制度之复杂及学校中课目之繁冗了。如东学、西学等所授课目相同，又何必有东、西学等之分立而徒耗国家财力、人力呢？

最初，贵族子弟似同时接受政治训练与军事教育。其后，社会逐渐进步，国家职务日趋复杂，如以一心力兼顾政治军事，难免有顾此失彼之苦，于是，统治阶级本身亦感到政治与军事有分工合作的必要，因此训练人才方针，遂有变更。

一方面，培养文士阶级，使其备用于内；另一方面，又训练武士阶级，使其应敌于外；文武分治形势，于焉告成。此非仅中国如此，西洋各国亦莫不然也。西洋中古时代盛行封建制度之际，其统治阶级亦分两类，政治上曰贵族（Nobility），军事上曰武士（Knight），贵族与武士，分工合作，统治人民。

我们说古代的士人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统治阶级，这并不是标新立异，也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事实根据的。且看《诗经》：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庭燎》）

“有駜有駢，駢彼乘驥；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首，君子有穀，诒孙子，于胥乐矣。”
(《有駢》)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
(《采菽》)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同上)

“樂只君子，殷天子之邦，樂只君子，万福攸同。”
(同上)

“嗟爾君子，无恒安处，靖共尔位，正直是与。”
(《小明》)

“嗟爾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
(同上)

这是“士”在政治上为统治阶级的证明。

“肃肃兔置，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兔置》)

“肃肃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同上)

“肃肃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同上)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君子于役》)

“猗嗟饐兮，清扬婉矣，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猗嗟》)

“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同上)

“之子于征，有闻无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车攻》)

“瞻彼洛兮，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妹鞶有奭，以作大师。”(《瞻彼洛兮》)

“君子万年，保其家室。”(同上)

“君子万年，保其家邦。”(同上)

“武人东征，不遑朝矣。”(《渐渐之石》)

这是“士”在军事上为统治阶级的证明。

《诗经》是大家所承认的最可靠的原始记载。《诗经》中所提到的“士人阶级”，并不限于“君子”一词。有时称“武夫”：“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兔置》)有时称“武人”：“武人东征，不遑朝矣。”“武人东征，不遑出矣。”“武人东征，不遑他矣。”(《渐渐之石》)有时称“征夫”：“骙骙征夫，每怀靡及。”(《皇皇者华》)但大体言之，称“君子”的地方实在较其他为多。“君子”就是有才能、有修养的知识阶级，也就是当时所称的士人阶级或者说统治阶级。孔子时常将“君子”与“小人”两个名词对立，相提并论。由此可知，“君

“子”就是当时的“士子”，“小人”就是一般平民。《论语》上时常提到“君子”、“小人”：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里仁》)

“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

君子有丰富的知识，有高度的涵养，其志在统治小人，行使百政，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人之事”。小人则愚昧蒙蔽，一切均不如君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因此，如放任人民自做自主，容易发生极恶劣的后果：“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古人看来是很自然而合理的职业分配，并没有丝毫不平等的含意。

也有人认为，“士”并不能包括所有知识阶级，而仅仅是从事于战斗的人员。例如，吕思勉氏在所著《中国通史》一书中说：“古代职业的区别，是为士农工商。士是战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称，可见古代的用人，专在战士中拔擢。”(第四章《阶级》)这种论调，可批评的地方很多。所谓“古代的用人，专在战士中拔擢。”这话是缺乏根据的。我们的见解，恰恰与此相反，认为古代的用人决非拔擢于战士之中，而系取得于士人阶级。古代所施者为文武合一的教育，官吏和战士很少区别，国家危急时，政府的官吏就投笔从戎，成为卓越的战士；国家平宁时，则又退伍回朝，仍为

官吏。故与其说拔擢战士为官吏，则毋宁说选召官吏为战士更为恰当。先秦时，政治和军事虽已有明显的分野，但在外侮煎迫，国难日亟时，政府依然要命官吏运筹帷幄，从事战斗。且看《史记》：

“甘茂为……丞相，秦命甘茂攻韩。”（《樗里子传》）

“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一年矣……阴修甲兵……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李斯传》）

李斯为相，不但“阴修甲兵”，而且“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最后更进而“北逐胡貉，南定百越”，这一连串伟大的军事计划，辉煌的军事胜利，并非由能战惯征的大将获得，而由“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运筹所致，足征政府官吏之兼治军事者，实属司空见惯，初不足诧异也。到了汉代，还有类似例子，如：

“文帝三年，灌婴为相。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婴将骑八万五千击匈奴，匈奴去。”（《汉书·灌婴传》）

由文人率领军队，从事征战，当然是临渴掘井，迫不得已的办法，古人为什么不擢用军事专门人才来担任这重大工作呢？我们的答案是这样的：“偃武兴文”是古代王者统治国家的最高原则。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公孙丑》）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道德经》第三十一

章)因此,君主非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发动战争,有时更裁减军旅,以示太平。即使暴虐喜杀的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并吞六国后,亦进行“偃干戈,毁甲兵”的工作:

“秦初并天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
镣,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史记·
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既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
……讲武之礼罢为角觝。”(《文献通考·兵考》)

基于这些传统的王道观念,故古代人对于战争是很鄙视的。国家一旦有事,就不得不动员文人、组织军队,执干戈以卫社稷。这是我们认定古代拔擢官吏以为战士的理由。

由此可见,古代的士人,就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阶级。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而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作用起见,乃设立学校,训练贵族子弟,以备各部门不时之需。正和《管子》所说的一样“士之子恒为士”。这种制度如能使新产出的“士”之人数和政府每年所需要补充的“官吏”的数额保持固定的比例,固然能使政治安定,不生变化;每个士人一出校门就可解决职业问题;同时政府所缺职位,亦因新产生“士人”的补充而解决。这原是最理想的情形。但事实上往往不能如此巧合。“士人”的产生每较事实上所需要者为多为速,其原因有二:第一,政府为了避免临渴掘井的麻烦,往往愿多生产多储存若干人才,以供不时之需;第二,政府为了有机会选择贤良才能之士任事,以刷新或改良吏治,乃不得不培养“士人”,使贤良才能之士成比例地增加。基此二因,政府每年所训练出来“士”之人数远较其需要补充者为多。因此就有一批知识分子被摈弃